

李白研究管窥



◎ 葛景春 著

◎ 河北大学出版社





李白研究管窥

葛景春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 宁

封面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闻 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研究管窥/葛景春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81028-800-8

I. 李… II. 葛… III. ①李白(701~762)—文学研
究—文集②李白(701~762)—人物研究—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145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1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10

字数:26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版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3 月第 1 次

定价:18.00 元

序

詹福瑞

景春学兄嘱我为他的李白研究论文集写序,我心中既惶愧,又充满了忧伤。我知道写这篇序的本不该是我,应是我们的导师詹镆先生,但是詹镆先生却在三年前离开了我们,随李白“驾鸿凌紫冥”了。

1981年詹镆先生与韩文佑、魏际昌、胡人龙先生合招第一届硕士生,景春兄从河南考入河北大学。上大学时,景春兄学的是英语。谁又能预料到,就是他真正继承了詹镆先生李白研究的衣钵,使詹门李白研究可以薪火相传!二十年来,景春兄在李白研究领域不停耕耘,硕果累累,成为中青年一辈学者中李白研究的大家。

在总结詹镆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就时,我强烈地感到,詹镆先生不仅治学严谨,而且是一个极有识见的专家。他一生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文,在唐代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他抓住了一个李白;而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他抓住了《文心雕龙》。李白不仅是唐代著名诗人,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诗人中最伟大的诗人,抓住了李白,就抓住了中国古代诗人的龙头。而《文心雕龙》一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使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也堪称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正是研究李白,不仅奠定了詹镆先生李白研究界的泰斗地位,也使他卓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而《文心雕龙》研究,不仅使他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使他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著名专家。但是,在詹镆先生那个时代,李白生平事迹、

诗文写作年代、诗人真伪等许多问题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所以,詹锓先生主要致力于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他的《李白诗文系年》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以年月为纲,考证李白诗文的创作年代,对李白三分之二以上作品进行了比较准确的系年,成为四十年代以来李白研究的重大成果。时至今日,李白生平事迹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仍是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而且景春兄就李白于天宝初由东鲁应诏入京问题、李白第一次“历抵卿相”为开元二十三年于东都洛阳等问题,也都做出了一些令人比较信服的考证工作。但是,今天我们仍拘守于此,不能越雷池一步,恐怕也很难有所成就,或有大的成就。

我常想,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不同,也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一种文化景观,作家也是一种文化景观,二者相互辉映。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讲知人论世:读其文,必知其人,论其事,实在是出自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以中国当代小说而言,不知作家为何许人,但同样不会影响到对作品的理解。而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文则不然。更何况有的作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文化景观完全可以脱离开其作品而独立存在,产生其自身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一种特殊现象,在李白及其作品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白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诗歌,还在于他的传奇身世和浪漫的人格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的传奇身世和人格魅力甚至超过了他的诗歌对后世的影响,李白本人就是一首感发人的豪情和想像力的诗!谈到李白,我们当然会想起他的《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篇,甚至连刚牙牙学语的童儿也会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谈到李白,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有李白传奇的人生故事。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此种长相,他是胡人,还是汉人?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传为太白金星转世。所以李白一出生就充满了传奇色彩。十年前,景春兄应长影一位导演之约,写《李白》剧本,我曾

为其设计第一个镜头：方黎明之时，太白星划过天际，坠入西天。镜头切入大漠黄沙，有驼铃声远来，镜头摇近，一峰骆驼载着一个年方五岁的小孩走向东方。我想只有这样写，才可能刻画出李白的不凡来。李白在京师，贺知章初见之，就惊呼为“谪仙人”。又有御手调羹、高力士脱靴之说，就连李白之死，都有醉入水中捕月而死这样近乎童话的美丽故事。

所以，研究李白，研究他的作品还不够，还要研究李白这个人；研究李白这个人的生平事迹、思想性格还不足，还要研究李白的事迹和思想性格中所含蕴的文化以及文化所体现的意义。李白不是一个单个的人，更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布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了盛唐文化气象，也寄予了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理想。正因为这样，我十分赞赏和钦佩景春兄十余年来一直坚持对李白进行文化分析的立场。1991年景春兄出版的《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从儒、道、兵法、纵横、任侠、屈骚精神等传统文化的角度剖析李白思想及其艺术风格，1994年出版的《李白与盛唐文化》著作，则从唐代的儒、释、道及艺术等角度分析唐代文化的浪漫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对李白思想性格与创作的影响，以及李白对盛唐文化精神形成的贡献，都打开了李白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李白研究的新进展。本书收入的部分论文，即可见这种文化研究的神龙首尾。

詹锳师生前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少有褒许之语。但是对景春却不然，他与景春平等讨论李白问题，对景春在李白研究方面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1990年，詹锳师在为景春《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写序时说：“近年来读了景春的文章，很受启发，真正感觉到他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了。”这既是詹锳先生对景春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是对他的期望和鼓励吧。看看景春兄这些年来李白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我想詹锳师在九天之上一定会满意地微笑了。

2002年1月20日

目 录

序·····	詹福瑞(1)
--------	----------

上 编

李白由东鲁入京考·····	(3)
略考“山东李白”之由来·····	(14)
“南陵”到底在哪里? ·····	(22)
李白《上李邕》写于蜀中·····	(30)
李白“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是在东都洛阳 ·····	(35)
李白、杜甫、高适的梁宋之游·····	(51)
李白《菩萨蛮》词新证·····	(58)
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中有《菩萨蛮》、《忆秦娥》词 ——李白《菩萨蛮》词补证·····	(62)

中 编

李白生平及其著作·····	(69)
中国古代个性解放的先驱,盛唐时代的天才诗人 ·····	(86)
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	(102)
李白与唐代文化精神·····	(107)

万里长江的风情画卷	
——李白与长江·····	(11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李白与黄河·····	(126)
李白与诸葛亮·····	(131)
李白与谢灵运的山水诗	
——兼论《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诗旨·····	(136)
李白与谢朓的山水诗·····	(145)
李杜诗风之变,是唐诗主潮之大变·····	(159)
不是幡动,是心动	
——试用接受美学的观点重新阐释李杜优劣论·····	(176)
酒仙·酒圣·酒徒	
——李白、杜甫、白居易咏酒诗之比较·····	(183)
李白与王昌龄绝句异同论·····	(196)

下 编

詹锳先生与二十世纪李白研究·····	(207)
裴斐先生与李白研究·····	(223)
学术转型期的李白研究(1901~1949)·····	(238)
李白研究五十年(1949~1999)·····	(275)
附:也谈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问题	
——与郁贤皓先生商榷·····	(293)
后记·····	(309)

上

编

李白由东鲁入京考

略考“山东李白”之由来

“南陵”到底在哪里？

李白《上李邕》写于蜀中

李白“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是在东都洛阳

李白、杜甫、高适的梁宋之游

李白《菩萨蛮》词新证

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中有《菩萨蛮》、《忆秦娥》词

——李白《菩萨蛮》词补证

李白由东鲁入京考

世之研究李白者，曾认为李白天宝初应诏由南陵入京，我们对此有些怀疑。

一、天宝初李白并未寄家南陵

在李白的生平中，大家曾认为他在天宝元年入京前，曾南游会稽，寄家南陵。但查李白同时代人及唐人的记载，如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及杜甫、高适、任华等人诗文，都不曾说李白在天宝初入京前曾到过南陵、会稽。只是到了李白死后将近二百年的后晋刘昫的《旧唐书·李白传》中才说：“天宝初，（李白）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又因《李太白集》中有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后世研究家遂断定，李白在天宝初应诏入京前曾携其子女南游，客游会稽，将其子女寄家南陵（见王琦《李白年谱》、黄锡珪《李白年谱》、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李杜年表》等）。

考太白行踪，天宝元年四、五月间，李白正在游泰山。白集中《游太山》六首，两宋本、缪（曰芑）本、王（琦）本题下俱注：“一作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太山”。第一首诗中云：“四月上太山，石屏御道开。”第五首云：“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可见李白游太山

是在夏初四、五月间。至《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的秋季，仅差二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若李白由东鲁迁家南陵，又要东游会稽与吴筠交游，待吴筠奉诏入京后又荐李白，又待玄宗下诏南陵或会稽征李白入京，其间决非二三个月内所能完成。考虑到这一层，詹锳先生在《系年》一书中，将李白进京的时间推迟了一年（天宝二年秋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样一推迟，以后有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如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见及李、杜、高适同游梁宋，俱在天宝三载，也顺序推迟到天宝四载，与史实已生冲突。（高适《东征赋》“岁在甲申（天宝三载），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如果不推迟，这许多事，再加上数千里往返的路程，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都发生二三个月的时间内，由东鲁迁家南陵、客游会稽，又应诏入京，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者，李白天宝元年赴会稽与吴筠交游，经郁贤皓、李宝均二先生考证，也发生了问题。（参见郁贤皓《吴筠推荐李白说辨疑》，《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李宝均《吴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文史哲》1981年，第1期）

据权德舆《唐故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序》（《权载之集》卷三十三）中云，吴筠在天宝应诏入京前是隐居在“南阳倚帝山”，没有去过会稽。天宝元年时，他与李白是同时应诏入京，本没有推荐李白之可能。他是在“（天宝）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寻又诏居翰林”，而李白供奉翰林却在天宝初，二者居翰林时间相距十余年，只是在安史之乱后，吴筠才“羽衣虚舟，泛然东下，栖匡庐，登会稽，浮浙河，息天柱”。而《旧唐书·吴筠传》中却说他“开元中，南游金陵，访道茅山。久之东游天台……在剡中与越中文人为诗酒之会”。显然和权德舆《吴尊师序》是矛盾的。据此，他若是与李白在会稽有交游的话，也只能在安史之乱以后。《旧唐书·吴筠传》后边记载：“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与《吴尊师序》正相符。由此可知，在天宝初未入京前，李、吴是有可能见面的。

至于吴筠推荐一事，唐人的记载中均未提到过。魏颢说李是“因持盈法师达”；刘全白认为是因为李白“名闻京师”；范传正认为是由于李白“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裴敬认为李白“以诗著名，召入翰林”；李阳冰认为是由于“皇初下诏，征就金马”；杜甫认为是贺知章的推崇：“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李白自己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说：“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于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不提荐举人。史书记载中，除了《旧唐书》曾提到吴筠推荐外，均无吴筠推荐之说。而《新唐书》却只记载了李白入京后贺知章向玄宗推荐李白之事。李宝均先生根据詹锼先生《系年》中所录玄宗天宝元年制诏：“前资官以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英秀，及军谋武艺者，所在俱以名荐京。”（《旧唐书·玄宗本纪》）从而认为，李白和吴筠同是应此诏而入京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李白被征若真是吴筠所荐，李在诗中不会根本不提他。像贺知章这个李白的知遇之人，在其死后，李白还多次写诗哭之。李白是一个重交谊和友情的人，绝不会对知遇推荐过自己的朋友只字不提。

关于李白到会稽的资料，在李白诗中有可证的，都已在他被赐金放还之后。如李白游越中所作《对酒忆贺监》、《重忆》、《采莲曲》、《越女词》及《越中秋怀》等安史之乱后避乱剡中的一些诗。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皆已是李杜游梁宋东鲁分别以后的事。

至于游南陵的一些诗，如《与五松山赠常赞府》、《书赠常赞府》、《答五松山杜秀才见赠》、《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记南陵题五松山》、《铜官山醉后绝句》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诗，均作于天宝十三载之后，可见李白游南陵是很晚的，最早也在天宝五载之后。

天宝初，李白子女实未离开过东鲁。除了《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外，其他再无材料可说明其子女曾住过南陵。相反，证明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过东鲁的证据却不少。

天宝五载,李白于江东《送杨燕之东鲁》中云:“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八载,又于江东《寄东鲁二稚子》:“别来向三年”,说明其子女在天宝五载李白离开东鲁南游时,一直是在东鲁的。天宝十五载,李白在《赠武十七谔》序中说:“余爱子伯禽在鲁,武谔许将冒胡兵以致之。”诗中说:“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当然,当时这一壮言未成现实,到至德二载时,伯禽犹在东鲁。故李白在《万愤词》中犹云:“穆陵关北愁爱子”。按:“穆陵关在沂水县北一百二十里,古齐关也。”(《山东通志》)而《百忧章》中却说:“星离一门,草擢二孩。”以上材料证明,在李白从璘入狱之前,其子女仍在东鲁,未随李白到江南。

此外,若说李白子女天宝初寄家南陵,何以无任何材料说明他们什么时候回的东鲁?若其子女家眷在南陵,李白出京后本应首先回南陵家中看望他的亲人,何以李白只回到东鲁任城家中?这也从侧面说明,李白子女从天宝初到至德二载从未离开过东鲁。

二、误为寄家南陵之原因

若李白未曾寄家南陵,则历代研究家们都断定李白天宝初寄子女于南陵的原因何在呢?

究其原因有三。主要是由于白集中一首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造成的。下面依次析之。

查盛唐人殷璠选同代人的作品集《河岳英灵集》(成书于天宝十二载),《南陵别儿童入京》题作《古意》。晚唐人韦庄选的《又玄集》中,此诗也题作《古意》。宋初姚铉《唐文粹》此诗犹题作《古意》。只是在宋刊本的《李太白文集》中,才开始题作《南陵别儿童入京》。其具体情况,略考如下:

据清玉海堂影宋本《李翰林集》来看,此诗已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玉海堂本此诗题下无注。此诗前且皆是与南陵和宣州有关的诗。玉海堂本是影刻的南宋咸淳本。王琦曾疑咸淳本为北宋乐史《李翰林集》的增益本。这说明,此诗题目很可能在乐史本中

已误为《南陵别儿童入京》，并已由歌行体类编入五七言杂诗“别”字类。宋敏求本在乐史本的基础上增益了不少诗文篇目。又“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而曾巩又对宋敏求本“考其先后而次第之”（《李太白文集后序》），这个本子于元丰三年由晏处善刻于苏州（现已不传），而现存的北京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南宋蜀刻本，就是出于此本。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就已记录这一本子，并说：“蜀本差传苏本（即晏处善本），而苏本不复有矣。”但苏本在“毛渐校刻之时于原稿小有更易”（詹锳先生《李白诗论丛》第5页），但基本上保留宋敏求本的面貌。日本静嘉堂影印的蜀刻本此诗题下已标注“一云古意”，清缪曰芑的影宋本也是如此。可见，宋敏求或曾巩已将此诗下加校注，当有所本，说明他们是很谨慎的。晚于乐史的姚铉，在所编的《唐文粹》中共选录了李白诗文五十余首，但此诗仍题为《古意》，据明汪伟器《重雕唐文粹序》中说，《唐文粹》“实本《文苑英华》，十摘其一”。但《文苑英华》并未选此诗。由此可见，姚铉所本的不是乐史本，当别有所自，而正与唐人选本《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此诗的题目相同。可见此是同出一源。由此可知，此诗题可能误自乐史本，而后又被后人纠正或加勘注说明（此有另文详考）。

我们认为此诗原题作《古意》是正确的。与诗中的内容也相符。诗中以古人朱买臣自比，要“辞家西入秦”去“游说万乘”。与唐人咏古抒怀与借古讽今的《古意》诗相似。

《古意》原为歌行体，在唐人诗中很流行。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李颀的《古意》“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等。但也有不是歌行的，这已与拟古、怀古的咏怀诗无甚大区别了。如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侍御》：“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及沈佺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香”等，都是这类诗。

李白这首别儿童入京诗中的内容与南陵的江南风物多不相符。“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黄鸡啄黍的情景应是中原风光，不似江南风物。黍属粟类，产在黄河流域。而江南主要

是产稻米,《旧唐书·食货志上》载:“(开元间)又有韦坚、规宇文融、杨慎矜之迹,乃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关中漕梁,凿广运潭以挽山东之粟,岁四百万石。”文中很明确,在唐代已是江淮以产稻米为主,而中原、关中产粟为主。黍又名黏黄米,是北方造酒的主要原料。在杜甫《羌村三首》中“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二句可证。而南方造酒则主要用秬稻。《宋书·陶渊明传》“公田悉吏令种秬稻”以酿酒。可见南、北方酿酒所用的粮食是大不一样的。

别儿童诗中“会稽愚妇轻买臣”。其中“会稽”二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旧唐书》中记载的李白天宝初入京前的会稽之行。这也是误会。其实李白这时只是用典,《汉书·朱买臣传》中说,会稽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卖樵以自给,其妻羞贫而去。诗中的“会稽愚妇”李白当有所指,但与李白游会稽无关。郭沫若认为是指刘氏,所见近是。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说:“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宗)。”李白研究家大多数认为,李白天宝初进京时,许氏已亡。只剩下一儿一女。细揣此诗意思,当是李白又娶,只是这个女子对李白并不大了解,羞于李白不能取得功名,遂有轻白之意,因此李白骂她是“会稽愚妇”。李白这里是以朱买臣自比,经荐举应诏入京,用典是很恰切的。《朱买臣传》中说他“得召公车,粮用乏,上计吏更乞丐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看来朱买臣被汉武帝召见,也主要是他“文辞英秀”,与李白相仿。

李白与刘氏诀后,大概很快又娶了鲁一妇人。此鲁一妇人,我们怀疑很可能就是《咏邻女东窗海石榴》中的鲁女。诗中云:“愿为东南枝,低头拂罗衣。无由一攀折,引领望金扉。”很可能李白子女是由此鲁女照顾的。若是这样,则李白入京根本不须将其子女带到南陵去寄养,从现存的材料中,也无从证明李白在南陵曾有家或近的亲友居住。他在江南漫游的寄足点是金陵和宣城,而寓居宣城也是在赐金放还以后的事。有人根据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中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从而断定说

李白自许氏亡后，一直未娶，这是不能成立的。古人母亡曰“失慈”，平阳与伯禽母亲已亡，当然就是“失慈”，“抚背复谁怜”是指他们丧母的事，并非无人抚养。否则才能“嘻笑牵人衣”的小孩子，无人照管怎么生活？根据魏颢序中所用的词语，许氏、宋（宗）氏为“娶”，刘氏与鲁一妇人为“合”，又根据只称鲁一妇人而不称其姓氏来看，此妇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她与刘氏可能不是李的正室。但李白入京后他的儿女由此鲁妇人照管，是极可能的。

误以为南陵入京的原因之二，是由于把《别内赴征》误作与别儿童诗是同时之作。其实《别内赴征》是李白应永王璘之征西赴江陵，别吴地家中宗氏而作。对此诗的写作时间，古人早就提出过疑问，如明朱谏《李诗辨疑》认为：“玩三诗气相似，皆效白而为之者，或他人之诗而误入于此也。夫吴关在吴地，望夫山在宣城，楚关在楚西界。按白传：白自蜀游江东，至会稽，随吴筠至长安见贺知章，荐于玄宗，供奉翰林。……初未尝自吴关而受征也。安得有王命之三征乎？”（转引自詹锼先生《李白诗文系年》第28页）朱谏这个问题提得不错，但未作深求。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指出：“其实这三首诗是至德元年应永王璘的征聘时所作的。”这一说法解答了上面的疑问。郭沫若引李白《与贾少公书》解释了“王命三征”的问题：“白绵疾疲荣，去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以行，以观进退。”郭沫若认为“王命崇重……辟书三至”就是“王命三征”的实际，并且指出：“李白随韦子春下庐山应在十二月下半月，已是冬末，故《别内赴征》第三首中有‘夜泣寒灯连晓月’句，他是被聘请去江陵的，故有‘行行泪尽楚关西’句，时令与地望都完全吻合。”郭沫若这些说法是极有见地的。《别内赴征》与《南陵别儿童入京》并非同时之作。我们可以从地望和时令上区别出来。别内诗是由“吴关”溯江而上而达到“楚关”西，而别儿童诗却是辞家“西入秦”；别内诗的时令是“夜泣寒灯”的冬月，别儿童诗却是“秋正肥”的秋天。辞家时的感情也不一样，别内诗是“行行泪尽”，感情缠绵悲切；而别儿童诗却是“仰天大笑出